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媒体融合的 格局重构^①

王炎龙,邱子昊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传媒业发展一方面依赖技术的变革推动,另一方面则需借助内生式的供给侧改革,同时也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平衡是传统媒体迫切需要转型的一个因素,长期需求侧为导向的媒体发展带来了信息生产严重同质化和过剩,技术介入一方面“解放”媒体人,另一方面加剧了用户需求。媒体融合作为传媒业发展的转型阶段,国家需要履行调控职责,在重构媒体融合的布局、调整媒体生产要素配置、监督媒体融合落地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从供给侧角度提供优化劳动力结构才能释放改革红利,通过资本深度介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以机制创新实现新的流程再造等实现主流媒体新格局重构。

关键词:媒体融合;供给侧改革;政策设计;资源配置;重构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5-0126-08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媒体融合自提出以来,从概念到实践一直在动态发展。互联网诞生之初主要表现为媒体形态的融合,即“+互联网”。传统媒体基于媒介技术变革、受众对媒介接触和使用习惯的变化以及媒体自身的拓展,需要借助网络渠道进行融合,这是一种外延式融合;互联移动化后,传播媒介的功能、手段以及组织结构等发生了质变,互动、在场以及共享改变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理念及方式,此时,媒体融合已更迭至内涵式融合,与“互联网+”的思维殊途同归。从媒体融合的变迁来看,它改变了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媒体业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①。因此,媒体融合不单是技术的变迁,更不是技术发生了变迁就意味着融合完成,而是要将媒体融合加以拓展,从媒介机构的内容生产

链条往外拉,延伸到社会接收或者消费环节,放大到整个产业文化形态^②。媒体融合过程中,新技术和资本是两个关键要素,对产业结构的重塑发挥着重要作用。媒介融合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是按照新的媒介提供的空间和可能进行的传播要素重组^③。在新的空间中,信息自我生产、自我分发,同时进行着意义的再生产,即未来的融合从“物质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社会空间的再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④,在时空转移的同时传播要素进行重组,重塑新的传媒产业链和产业模式,实现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资本在重新建构传媒生态格局、推进媒体融合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实现传统媒体的创收,增强经济实力等^⑤。

媒体融合的变革趋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一脉相承。经济学领域中的供给侧结

① 收稿日期:2019-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XW090)

作者简介:王炎龙(1972—),男,湖南双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网络与新媒体产业、公益传播研究。

①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7页。

②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③韩立新:《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④李彪:《未来媒体视域下媒体融合空间转向与产业重构》,《编辑之友》2018年第3期。

⑤张春朗,迟铭:《传媒产业:激荡变革与创新重构》,《电视研究》2017年第11期。

结构性改革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要素的最优配置,实现经济增长效率。而媒体融合的实质是多种媒体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是生产形态的融合,具体路径在横向上表现为媒体系统之间的融合,在纵向上则是媒体系统内部诸多要素之间的融合,从这个层面来看,媒体融合是通过调整媒体结构以优化各要素的配置,实现媒体业态的良性运转,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此外,媒体先天性优越感来源于政策性红利的持续衍生,所有权的国有属性和行业发展的财政支撑,在传媒市场竞争态势下有自在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导和认同,形成了信息生产模式的固化思维。新常态经济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已经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旧有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消费出现的新动态^①。在传媒领域内,推进媒体融合是实现供需再平衡的路径,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媒介形态、媒介功能、传播手段、资本所有权、组织结构等一切价值链节点要素的融合来实现。因此,将媒体融合置于供给侧改革的语境下探讨其发展路径,也许能提供一种视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结构”而非“改革”,其中“结构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范式(paradigm)或图式(schema)体系,具备整体性、转换型和自身调整性”^②。整体性强调的是整体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不是简单地将各组成成分进行相加,而是要把组成整体的各成分的性质赋予整体。虽然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是在经济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对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处于整体之中的需求侧同样发生相应的变化,以维持经济领域的整体平衡。从这点出发,传媒产业进行的媒体融合发展策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很高的契合度。从共性层面上看,当前传统媒体发展同样遭遇供给与需求失衡的问题,供给侧的要素改革与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一致;从形式上看,媒体融合发展从结构主义角度看是將技术与媒体融合,实现“1+1>2”的整体性

效果,具有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联系;从本质上看,媒体融合是希望通过技术介入达到媒体产业转型发展,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范式,具备结构主义的特征。因此,媒体融合的实质是通过解构原有的生产关系、产业格局,在政策和技术的辅助下,对传媒产业进行结构性重构,寻求具有全局观、整体性的适合产业发展的新图式。

虽然传媒业生产的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具有其特殊性,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产品,受众是其消费者,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传媒业生产的产品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追求物质回报的同时,也要兼顾宣传导向和传播效应^③。经济学家将供给侧改革的任务概括为“产品个性化,服务人性化,品牌国际化,把顾客留在国内”^④,这与媒体转型的任务不谋而合。我国传媒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文化资源和要素向优势领域、优秀企业、优质项目集聚,培育新业态,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新闻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力^⑤。面对技术介入对传媒生态的威胁^⑥,传统媒体的用户流失,造成偏离市场、资源浪费大、效用低的“新闻产能过剩”^⑦等现象,本文试图通过这样的逻辑思路展开分析,即解析传媒业在需求侧模式下的生存困局,阐述国家通过宏观调控解构传媒产业的困局以及供给侧如何回应需求侧的问题、重构新的媒体格局。因此,本文主要从供需两个维度探究: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否提供用户或受众需要的产品,解决市场乏力的困局?供给侧改革能否激活体制机制、促进产业升级、提高产能和释放效益?

二 需求侧模式下媒体发展的结构困局

长期以来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同样,以用户需求等为导向的媒体发展模式也给传媒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规模化扩张的媒体发展态势,造成信息生产严重同质化,信息产能过剩;新技术的引入,不仅进一步加剧规模化扩张导致的信息生产同质化和产能过剩

①黄剑:《论创新驱动理念下的供给侧改革》,《中国流通经济》2016年第5期。

②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页。

③赵宇翀:《电视媒体也需要“供给侧改革”》,《传媒》2016年第23期。

④吴敬琏,厉以宁,等:《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⑤张红彬:《新时代新闻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考》,《中国编辑》2018年第4期。

⑥蒋晓丽,任雅仙:《媒介融合的生态批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⑦蒋亚平:《深化新闻供给侧改革 创新繁荣新闻产品供给——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和网信工作讲话有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的问题,也给媒体人带来了职业危机感和倦怠感;为了满足受众需求,一味地规模化扩张和对接新技术,致使受众在几何级增长的信息迭代中产生焦虑;技术带来的信息精准投放,禁锢了用户获取信息的宽度,将用户囚禁于技术建构的信息茧房之中。

(一) 同质化与产能过剩:规模化扩张的效率困局

从需求侧改革来看,我国媒体行业在一定阶段依赖规模扩张来满足受众需求,而且是主要集中在短短10余年间实现,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国内都市媒体在数量、种类、结构以及内容等方面突飞猛进。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宏观背景在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在此基础上公众对信息传播、生活服务以及文化娱乐诉求也剧增。基于此,国家通过鼓励创办媒体,缓解信息生产稀缺的瓶颈^①。但这种发展模式属于粗放型的“投资+消费”驱动模式,在另一个层面导致的结果是信息生产机构同质化严重,信息产能逐步过剩。

传统信息时代,受渠道、信息生产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信息生产难以满足需求,媒体领域为解决信息稀缺的现状采取扩大供给的方案。具体做法如上文所言,扩张式创办都市媒体是一种自觉的扩容,互联网发展成为海量信息储存库,移动端成为常触媒介后实现了“产消传合一”,导致的结果是信息去产能成为一种结构性难题,造成信息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②。供给侧改革首先是要破除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纠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激励约束的扭曲^③。传统媒体的盈利主要是内容生产和主要依附于内容的广告收入,其单一性模式决定了其产业的脆弱性。因此,媒体融合中,通过技术资源、平台资源、内容资源这三者的整合,实现集群式聚合。

(二) 认同式微与职业倦怠:技术介入的效率瓶颈

借用劳动力的三要素观点,媒体生产力构成

的三个要素可以归纳为:以媒介技术为主的传播工具,进入媒介生产过程的信息材料,具有相应媒介信息生产经验及技能的媒体从业者。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媒介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媒体人才则是运用技术的关键者。在媒体扩张时期,同样出现了所谓“人口规模红利”,即大众传媒在信息生产以及集团化整合中,通过大力配置编辑记者,实现规模化,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传播条件,整个媒体生态因此而呈现高投资、高生产和高增长的局面。媒体行业成为职场的追逐热点,记者也成为了一种具有高显示度的职业,尤其是传统媒体领域表现更为突出。

互联网媒体的兴起,海量信息的爆发,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涌现,传统媒体的“信息优越感”式微。基于此,新闻记者逐步产生了媒体焦虑感和职业倦怠感。究其原因,一方面表现为很大一部分从业者其身份游离于体制外,导致自我认同感降低;同时,职业责任对个体价值体现度不断强化,进一步加剧从业者的焦虑感。另一方面,基于技术变革引发的媒体融合,既提高了对编辑记者的职业素养要求,又挤压了其信息生产的效率空间,职业倦怠成为部分媒体从业者的状态,也导致了人才的不断流失。戴维·温伯格在《知识边界》中提出“互联网过滤器并不会真的删除东西,而只是把受青睐的材料拿得更近一些——我们对这种新的多样性的价值观感到极度困惑”^④。传媒生产者既要生产信息,又要传递价值。传统媒体、互联网媒体以及自媒体共存格局中,信息生产者在提升内容价值与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遭遇效率瓶颈。

(三) 信息焦虑与窄化:内容供需的关系失衡

传媒内容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把握传媒内容变化趋势,以趋势引领媒体的未来发展,而非以满足受众的此时此地的需要来决定媒体内容^⑤。技术与媒体的联姻,既延续了用户引领产品的势态,也扩张了人们生产、消费信息的欲望。首先,信息生产方式的多元化,致使信息生产过剩,信息超载严重,致使受众产生信息焦虑。信息生产方式和传播主体数量激增,信息消费者每天接收数

①蒋晓丽,贾瑞琪:《顺应社会变迁·调整三重利益:媒体融合的核心要义》,《新闻界》2019年第1期。

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20页。该观点是凯恩斯对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思想的总结,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从结构的视角论述了“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该思想即为“萨伊定律”。详见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2页。

③林卫斌,苏剑:《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及其实现方式》,《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1期。

④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胡泳、高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⑤胡沈明:《传统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的三条路径》,《新闻界》2016年第13期。

以万计的信息,他们生活在被信息包围的海洋中,信息超载已经成为一个客观存在并普遍认同的事实,这是技术助力传媒产业加剧产能过剩的直接表现。其次,信息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万众皆媒”的时代给信息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大跃进,人人拥有麦克风进行信息生产,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自媒体对信息的把关、选择和甄别能力有限,一些有功利性目的、恶意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消解了信息的权威性,消耗信息消费者的时间,加大了信息获取的难度和用户的信息焦虑。最后,技术介入后的信息生产由“采-编-发”融合为三位一体,传播路径也由粗放式传播演变为个性化分发。精准的信息传播模式验证了尼葛洛庞帝的预言,也印证了桑斯坦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效应^①。个性化信息服务看似是技术为用户过滤了无用信息,实则是以用户需求为基础,通过技术手段为用户建构信息茧房,让用户走进毫无隐私可言的圆形监狱,沦为技术的奴隶。

需求是媒体发展的动力源泉。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用户信息焦虑是由于信息生产主体、传播渠道等传媒环境变革,致使信息生产以几何级数的形式剧增,是产能过剩的一种体现,属于供过于求。实际上媒介环境的改变,传统意义上的供方(信息生产者)与需方(受众)的界限已经模糊,消弭了供求双方的边界。从信息消费者的角度看,信息焦虑表面是信息生产过剩导致的,但实质是信息消费者需求过剩引起的。技术赋权强化了消费者的表达需求,他们借助网站、社交平台等进行信息生产,表达其某种需求,这种传-受一体化的信息生产方式是信息超载的主要原因。信息茧房的形成是专业化信息生产者利用技术手段“窥探”用户需求,根据用户需求主动为用户屏蔽其不感兴趣的信息,并假以“精准”“个性化”“定制”等名义,造成用户拥有“过滤所读所看所听的力量”的假象,这些问题并非根源于制造者,相反的,是来自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和偏好^②,是消费者在为自己的需求埋单。

三 媒体融合发展规制的重构功能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的是以改革为统领,

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系统工程。从既有的需求管理逻辑向供给侧过度,需要把结构进一步细化到各种各样复杂的指标不可通约的不同要素、结构状态上,而结构优化必然需要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机制安排、制度供给^③。因此,作为顶层设计者的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助力传媒产业的结构性改革。

(一) 顶层设计,架构媒体融合宏观战略

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舆论监督和引导等工作被提升到战略层面,并在以后一系列政策设计中不断完善,为推动传统媒体转型奠定了基础。《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表明了媒体融合从行业自发转型上升到国家战略布局,为媒体融合在国家层面提供制度保障。《意见》中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媒体融合提出的整体性要求:媒体融合发展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维护整体产业发展平衡,即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媒体融合发展要保证各组成部分的功能,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一体化发展;要坚持中心性发展原则,以内容建设为融合的根本要务,以先进技术为翼,助推媒体产业深度融合;媒体融合要有全局观,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现代传播体系”的融合发展范式,架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后的媒体产业格局。

由此可见,国家通过调控职能,重构媒体产业结构,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源。《意见》中强调的“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现代传播体系”是从结构层面提出的媒体融合所要形成的新型媒体结构,政府通过政策设计重构产业结构是建构新型产业格局的题中应有之意^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从要素端、生产端改革入手,通过对要素结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和优化^⑤,实现整个产业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利于改善供给结构和资源配置,使产品供给更加有效地对接市场需求,促进生产

①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②凯斯·R·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4、10页。

③贾康:《供给侧改革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版,第6、12页。

④黄良奇:《从平台经济域到生命体、媒体融合的实践范式与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3期。

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选题研究中心,王佳宁,盛朝迅:《重点领域改革节点研判: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2016年第1期。

要素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流动^①。可以说《意见》从宏观角度对媒体融合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对媒体规模化扩张进行了约束。顶层政策设计重新配置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明确了媒体融合的发展路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要求是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内容为技术为用、内容为体技术为翼”的发展路径。这一发展路径纠正了目前媒体融合过程出现的偏差:一是传统媒体放弃自身的优质内容资源,盲目追求技术;二是粗暴式加减,削足适履进行技术嫁接。政策设计通过明确融合过程中的主次关系,强调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优势互补,破除媒体融合中不合理的资源配置问题。

(二)中观把控,优化产业生产要素配置

我国文化产业存在资本供给不足且结构失衡、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现象,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任务在于纠正资本、劳动力、技术等领域的要素错配,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有效供给能力^②。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直在调控媒体产业生产要素错配问题,以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

打通体制,吸引社会资本。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必然要打破传统媒体固有的体制模式,让具有资本和技术的互联网公司进入媒体行业,建立新的媒资系统,破解传统媒体企业融合的体制难题和资金困境。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企业,资本更多的是指文化资本,通过媒体融合拓宽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提升网络文化的供给能力。优化人才队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介入,给传统媒体人带来焦虑,导致一部分优秀的媒体人出走。传统的论资排辈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优秀媒体人的工作热情和归属感。在意识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竞争是最终的竞争”“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后,媒体行业要建立明确的人才激励机制。一是优化资源配置,要确定媒体采编人员的主体地位,确保资源向采编人员集中,分配倾向优秀人才;二是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取消媒体行业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体系,建立以成绩、能力选拔人才的机制;三是去行

政化,引导具有优秀采编能力的行政人员回归一线,带动人才发展,增强从业人员的归属感;四是优化薪酬制度,破解媒体人的薪资困境,从而更好地从事媒体工作^③。创新引领,拓展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要素供给包括创新文化科技供给、资本供给、人才供给等,它促进提升生产要素效率,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引擎^④。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业态……主动适用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政府对媒体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提出的要求,而形成新主体、培育新动力和发展新产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这与政府在媒体融合的政策设计上完全契合。而技术本身就是供给侧的四要素之一,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都是以技术为抓手,进行媒体生产流程再造。

(三)微观实践,建构“最后一公里”媒体矩阵

宏观调控是政府从整体和长远角度对媒体融合发展在政策层面提供的支持和保障,但要把宣传工作传递到每一位公民,需要建设20世纪80年代“县-乡-村-户”的广播网一样的新型媒体矩阵,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解决好最大面积传递宣传精神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形成新主体,培育新动力,发展新产业^⑤,从这点来看媒体融合的政策设计本身就是对传媒行业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媒体融合的最终形态,即传统媒体以优质资源供养新兴媒体,新兴媒体靠技术和资本反补传统媒体发展,二者通过优势互补,建立互利共生的媒体生态,形成新的产业格局。传统媒体发展乏力一方面是人才机制问题,另一方面是资本匮乏问题。与新兴媒体进行融合,以及政策的宏观设计和中观调控,为传媒业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提供新的动力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催生出的新产业是结构调整过程中衍生出的新形态,而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以及现代传播体系,属于媒体融合催生的新产业形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是媒体产业结构性改

①杨飞虎,晏朝飞,熊毅:《政府投资、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究》2016年第12期。

②卞晓丹,钟廷勇:《空间集聚与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基于要素错配的视角》,《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

③上海市委宣传部:《深度融合 整体转型 着力构建媒体融合发展新格局》,《新闻记者》2018年第10期。

④安娜,张文松:《新时代中国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9期。

⑤吴敬琏,厉以宁,郑永年:《读懂供给侧改革》,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革的方案。它从宏观上对媒体产业发展结构进行了调整,对信息生产、传播等流程提出具体措施,对人才培养、人才激励等机制问题进行了把控……中央厨房、封面新闻、澎湃新闻等转型后的媒体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新型主流媒体-新型媒体集团-现代传播体系”的产业格局开始实现,而微观层面如何落地是媒体融合政策设计的另一命题。

媒体融合的目的,就是让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或者说把落后产能转化为先进产能^①,同样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媒体融合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落地生根,让新主体发挥作用,使新动力运转起来,让新产业“活”起来。继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后,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要求。这是政府再次发挥调控职能,从微观层面落实媒体融合的具体走向。县级媒体融合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媒体融合从中央转向地方,由省级以上媒体延伸到基层媒体,同时也宣告媒体融合从“个体-集团-体系”的横向发展向“中央-基层”的垂直方向深耕,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媒体节点进一步打通,“中央-省-市-县”的媒体网络矩阵建立,全域范围内的媒体产业被全盘激活。县级媒体融合既是媒体融合落地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媒体行业产能转换的重要节点。受人力、地域、经济等客观条件限制,媒体生存方式表现出行政与市场的混合模式,因同质化程度高、缺乏竞争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甚是低下,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型的办媒体方案^②,县级媒体融合的策略能够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在体制、机制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如北京市16个区联合成立融媒体中心,实现北京全域范围内联通汇聚。

四 供给侧改革思维下重构新型媒体格局

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经济变量,常常对宏观经济和中观产业产生刺激或抑制,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的力量^③。在解析了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需求侧遇到的困局、论述了政府发挥调控职能进行战略布局和发展路径规划的顶层设计后,供给端

如何破除困局、落实政策是媒体产业真正做到“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关键。总结目前媒体产业的需求侧困局主要表现:一是生产力方面,传统优质人才与新兴媒体人才之间的平衡问题;二是资本问题,林南认为资本的中心主题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获得^④,所以资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产关系;三是媒体生态问题,要明确媒体融合过程中技术的角色,从全局把握融合的流程以及融合后的媒介生态格局。因此,需要结合供给侧的要素回应需求困局、落实政策设计,用供给侧思维对媒体产业进行结构性改革,重构新型媒体产业结构。

(一) 劳动力结构优化释放红利

劳动力作为供给侧四要素之一,其结构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一是劳动力数量,二是劳动力素质,三是劳动力结构层次。首先从劳动力数量上看,一方面随着传统媒体人才的流失,又碍于体制规制的限制,媒体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进而影响效率。通过与新兴媒体融合,在万众皆媒的时代,大量人口通过社交网络等平台加入到媒体行业,第一时间将身边发生的事情进行在场式报道,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由于大量的劳动力参与到行业中,降低了媒体行业的劳动成本,并且提高了劳动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由于媒体行业的特殊性,在人才方面存在着制度壁垒,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跨界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数量。《关于深化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采编播管岗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的核心内容包括:统筹配置编制资源、开展媒体从业人员编制的总量管理试点、进一步深化媒体人事薪酬制度的改革、完善媒体从业者考核评价及其退出机制。这些措施破除了制度壁垒,激活了固化的媒体人事体制,释放了制度红利,是传媒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世纪媒体扩张产生的是外在的规模化红利,持续是阶段性的;而进一步深化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将产生内质的效率性红利,具有效应的稳定性。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融合,传媒人才的流入,将直接提升媒体融合的效率。

劳动力素质体现劳动力的质量。媒体融合包括人才的融合,传统媒体的人才深耕文化产业,但技术能力欠缺,新兴媒体人才技术娴熟,但缺少

①张显峰:《媒体融合的根本是内容供给侧改革》,《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2期。

②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新闻界》2018年第9期。

③于正凯:《技术、资本、市场、政策——理解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进路》,《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

④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优质内容甄别的能力。如果媒体融合不进行人才融合就会出现牝鸡司晨的现象,大大降低劳动效率。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体的发展越来越青睐与技术联姻,只有把具有专业知识的高质量人才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的引进,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也是媒体融合题中应有之意。另外,劳动力结构问题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劳动力结构在经济学领域更多从年龄组成维度分析,而在文化产业领域劳动力结构可以更多的从人才质量维度分析。媒体融合进程不断深化,融合领域不断拓宽,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加入到队伍中来,如既懂技术又懂媒体的复合型人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产学研一体化人才,高精尖的研发人才等。囊括一批满足不同需求层次的高质量人才,才能够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二) 资本推动资源合理配置

媒体发展进程中,资本扮演了推手的角色。集团化改革中,产业的剥离与重组,资本是“反哺者”;传媒产业上市中,股权分配与价值驱动相辅相成,资本是“助推者”。直至时下的“中央厨房”生产理念,传媒的智能化生产,除了技术因素外,资本一直在深度介入,从而有效打破了介质壁垒。在当前的媒体格局中,各地传媒集团在资本的推动下,逐步涉足和拓展相关内容或产业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寻求生存发展的多维突破成为共同选择,只不过由于地域的区隔性,其举措、力度和效果都将存在很大差异。

资本助推媒体朝向品牌更响、内容更优、公信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的方向发展。“资本钟爱纸媒,绝对不是为了怀旧或者‘扑向一堵正在倒塌的墙’,而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1)看好纸媒的品牌影响力。品牌在,影响力就在。(2)看好纸媒的权威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舆论影响力。”^①因此说资本的力量与传统媒体结合是必然趋势。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在投入到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实现增值需要借助有价值的实体资源,在传媒行业具有价值的实体资源就是纸媒的品牌、内容、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资本能够加快传统媒体转型的步伐,能够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三) 机制创新促进融合式流程再造

媒体融合发展基于技术有其相应的路径:一是多媒体,它将异质媒体数据进行重组和分析处

理,形成交互性、非线性和集成性的超媒体,满足用户图文影音一体的互动功能需求,这也是信息海量扩容的初级形态;二是融媒体,通过整合异质媒体的资源、内容及传播优势,实现结构性重组和功能优化,达到效益共融,形态上通常以“集群”的形式出现。以成都传媒集团为例,在《成都市媒体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推出后,该集团通过机制创新,在人力资源、新闻采编、管理体制、市场营销四个层面推进改革,构建融媒体集群矩阵,包括网站集群、微博微信集群、客户端集群等,这是因用户聚集而形成的融媒体中级形态;三是智媒体,即智慧媒体。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资讯媒体,智媒体则是通过生产智能化并提供智慧的个性化服务,这样的服务具有定制化特征,基于大数据和云内容,分析用户的兴趣和情感倾向,并由此而实现精准服务。以上媒体融合的三个阶段,机制创新无一例外。其中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深度融合的结果。

媒体深度融合关键体现在媒介资源要素的融合,注重资源重构,并用流程再造促内容融合;将各要素优化组合、重新构建,建立起从物理层面的“混合”到化学层面的“融合”式媒体业态。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媒体融合机制创新是分层分步骤的,第一步是“中心借力式”,即以传统媒体为中心,嫁接新型的媒介形式、手段、技术和渠道,实现初级转型;第二步是“合纵联横式”,即以单个传媒集团为框架,通过同一集团化主体下不同媒体的集优集群,形成分层的具有直接利益诉求的“利缘体”;第三步“价值融合式”,即以新媒体技术和运营模式为中心,融合各类媒体的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编辑能力、组织方式等价值要素,构建价值传播的媒介新体系。这是传统媒体的“融合三部曲”,其流程再造属于外化型的创新路径。对于新媒体而言,先天性基因是技术和智能,其融合不是渐进式,而是旨在构建融人类生活、情感、诉求等为一体的“人性化媒体”^②,即无限联结媒介技术与传播情境,让技术成为人类肌体和意识的一种系统功能,其流程再造属于内化型的。

五 结语

传统的供给侧的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其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属于媒体融合内部因素,三种要素的配置错位为媒体融合带来

^①常江,杨奇光:《资本的力量:聚焦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新闻界》2016年第2期。

^②兰甲云,艾冬丽:《微信公众平台信息传播失范行为及其协同治理路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了阻力;制度则归属于外部因素,由于媒体产业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更多的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体系设计,因此,制度既可以成为媒体发展的绊脚石,也可能是媒体发展的驱动力。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兴媒体重新定义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性,并由此而进入一个“新兴媒体+”时代,即其他相关领域一旦与新兴媒体结合都会随之而变化。受新兴媒体影响,传媒领域各层面的价值链在融合中向非线性方向衍变。所以,内容生产、传播载体、宏观经济对媒体融合的刺激度,决定了三者相互共变共振所带来的影响和效应。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对产业产生深远影响,但从实质分析是传媒产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平衡的原因导致每一次技术变革都对媒体产业产生冲击。媒体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由于技术进步与创新驱动,结构化的转型升级将促进媒体融合的理念不断革新和实践创新,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从宏观上把控了媒体融合后的产业生态格局,从微观层面明确了媒体产业体系的多层级、跨区域的发展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媒体融合,通过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外部因素的调控,

确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纵向深耕,从区域到区域横向连接的“伞”状媒体矩阵,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把“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涵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②。传媒产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重构的具有整体观念、规律性、自身调试的新型媒体业态就是要让价值规律回归主体,重塑竞争和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媒体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决市场乏力的困局。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配置媒体融合过程中各主体、各种资源要素关系,从而激活体制机制、提高产能和释放效益,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新型媒体体系建设战略。

Reconstruction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ANG Yan-long & QIU Zi-h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dustry rel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he endogenous supply-side reform, as well a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untr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demand-side and the supply-side is a factor in the ur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The long-term demand-side-oriented media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about serious homogenization and excess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he intervention of technology has “liberated” media practitioner, on the one hand, and another aspects have increased the users’ demand. As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industry, the state needs to fulfill the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tructuring the layout of media integration, adjusting the allocation of media production factors, and supervising the media integration. Under the guarantee of national policies, it is possible to provide a reform of the labor force from the supply-side to release the reform dividend,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rough deep involvement of capital, and to implement new process reengineering through mechanism innovation to solve the dilemma brought by the demand-side.

Key words: media convergence; supply-side reform; policy design; resource allocation; re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蒋云霞)

^①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②黄文川:《怎样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访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求是》2013年第24期。